

## 武訓精神

張丕介先生

新亞書院的前身為亞洲文商學院。雖說學院的存在時間只有短短的半年（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），便改組為現在的新亞書院，但它的精神，它的旨趣，和它的事業理想，都因它的後身新亞書院的誕生，而被全部繼承，並且繼續的發揚，繼續的見之於實際了。我回憶亞洲文商學院創立的艱難經過，和它第一次舉行開學典禮的一幕，使我更明白這一文化事業的特殊精神，我無以名之，姑名之為「武訓精神」罷。

讓我簡單的回憶一下那個值得永久紀念的日子——亞洲文商學院開幕的日子。

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下午七時，我應邀參加亞洲文商學院的開學典禮。地點在九龍佐頓道偉晴街華南中學的三樓上。小小的三間教室是向中學租來的臨時校舍。大約是初中或者小學生的課室吧，所以教室中的桌椅都特別矮小。中學部兼辦夜校，所以四周空氣也特別熱鬧，不時的聽到大羣少年兒童的喧鬧聲音。就在這樣客觀環境之下，亞洲文商學院——一個大學性質的教育事業，一個以發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神，溝通東西文化思想為使命的學校，誕生了！這幾乎是很難令局外人想像的。

在這一臨時校舍的中間一間，把長條小課桌作成口字形的排列。第一屆錄取新生三十幾人圍坐在四週。五六位新聘教授並坐口形的底部長凳上。桌上陳列着少許茶點，每人面前放着一隻茶杯。主席是學院創辦人之一

的史學大師錢賓四（穆）先生。他宣布學院成立。這是開學典禮？沒有音樂，沒有唱歌，沒有旗幟，沒有任何儀式，簡單得出人意外。然而到席的每一個人都充滿了興奮而莊嚴的心情，整個意識上充滿了開幕開學的隆重意義。

錢先生站在口字形的頂部課桌後面，面向全體，用一種動人的口吻，向大家報告這一學校創辦的目的和籌備的經過。沒有誇張，沒有謙辭，但聽者却在默默之中，受了極大的感動：

「文化教育是有其歷史傳統的，不能隨便抄襲別人的制度。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最好的莫過於書院制度。

大學教育是有其歷史傳統的，不能隨便抄襲別人的制度。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最好的莫過於書院制度。私人講學，培養通材，是我們傳統教育中最值得保存的先例。

中國人應真正了解中國文化，養成自家適用的建設人材。

讀書的目的必須放得遠大。要替文化負責任，便要先把自已培養成完人。要具備中國文化的知識，同時也要了解世界各種文化。要發揚中國文化，也要溝通東西不同的文化。

我們的開始是艱難的，但我們的文化使命却是異常重大的。籌備創立的艱難、比起將來發展的艱難來，現在還算輕微的，現在開始了，將來的大責任完全靠大家的共同努力。」

錢先生邀請到席的同仁繼續說話。我默默地觀察在場各先生，顯然看出大家心情的感動。他們都是各大學任教十年到三十年左右的老教育家。現在赤手空拳的站在香港，受着說不出的困難的壓迫。然而爲了共同的理想，却參加了這個一文不名和毫無憑藉的文化事業。他們不但要義務的教課，還要肩負起以後發展的重大責任。但大家並無絲毫猶疑，一個接一個的起來，表示對這一事業和理想的信心。我記得那次出席的除錢先生外

，有崔普琴、程兆熊、劉尚義諸先生，他們一直到现在還都繼續着爲新亞書院熱心任教，實踐當日的諾言，或雖暫時離校，但亦如在校時一樣熱心的盡力於學校事業的發展。

在錢先生和同仁繼續發言的時間，我留心觀察四周靜聽的學生，從他們的表情上可以推斷他們心理的變化。我敢斷言，他們聽到各先生談話後，多少感覺到一點意外，一點出乎意外的高興。簡陋的臨時校舍，和毫無經濟基礎的情形，原已絕難隱飾的告訴了大家，這間學校遠不足和國內各大學相比較，也不足和香港若干專科學校相比較。對這一學校還能抱什麼希望麼？然而初步的印象是何等浮淺啊。各先生的誠懇態度，和他們所說的理想和抱負才是這一文化事業的真精神真希望呢。我觀察他們的表情，看他們欣喜的眼光，我知道大家心裡得到如何稱心的滿足。物質條件不會使大家失望，而教育家的精神和毅力，却贏得了這羣青年的傾服。從那天起，新亞的精神，便一直貫注到二年半以後的現在。爲文化理想而學問，爲社會進步而服務，這一偉大高尚的精神，鑄成了每一新亞學生人格的一部份。兩年以後，他們自動的創辦一個義務小學，抱着他們師長們的志願，致力於社會性的文化事業。這不是偶然的罷。

在各位先生講話之後，錢先生要我說幾句話。我一時想不到應該說什麼。但我心中盤旋着一個感想，我覺得文商學院的精神太像我幼年時期所經歷的情形了，於是我就站起來，講了一段有關武訓義學的話。

我的啓蒙教育時代是在第二武訓義學渡過的。義學設在離我家約有二里之遙的楊二莊。我父親是義學創辦後被武訓先生邀去担任第一任教員的，所以我從三歲起便生活在義學裡，一直到十二歲才到外面讀書。那時武訓先生已逝世十多年。但是在我的故鄉，在義學之中，人人崇拜景仰那一非常高尚的人格。關於他的一生，大至於他創辦義學，小至於他的滑稽言行，談起來，人人如數家珍。一個終身從事乞討的窮教化子，而終於獨立

創辦了三處義學，他的堅苦卓絕，他的大公忘我，他的崇高理想，真是曠古未聞的，人們對於他的崇拜，實是人心的自然流露。窮苦人家子弟有了讀書的機會，社會文化水準之提高，也是當然的結果，而最爲動人的却是武訓精神的影響，是那樣深遠而普遍。第二義學創立後不久，他又辦了一間第三義學（第一義學在臨清，第二義學即作者讀書處，第三義學在堂邑縣的柳林鎮）。每處創立後，都得到地方人熱心的捐贈，使每一學校都有一筆很可觀的基金（學田）。每一處創立後，都造成了附近地方熱心讀書的風氣。以我們的村莊說，幾乎男女兒童沒有例外的都受了啓蒙教育（女校設立稍後，但普及教育效果極大）。生活在這一環境之下的我，武訓先生的精神對我影響之深，自是當然的。我之立志讀書，讀書之後，抱定志願從事於教育事業，應該說是這一影響的表現——雖然我對文化事業說不上什麼貢獻，但我之對於武訓精神，則是自信十分澈底的。在我心目中，孔孟是聖人，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千古不磨的偉大人格。但我所崇拜的另一個崇高人格，却是武訓先生，因此，凡是具有武訓精神的教育家，具有武訓精神的文化事業，都是我衷心敬佩的。如果我有一份力量，我便願爲這一事業而盡力。

對於亞洲文商學院和它的後身新亞書院，我始終敬佩它的創辦人參加人贊助人各先生的精神，因爲在今天這一環境之下，而有這樣一所堅苦奮鬥的社會文化事業，證明它在精神上就是武訓先生精神的再生。

武訓先生生於一八三八年，今年是他一百十五週年的誕辰；死於一八九七年，今年是他五十五週年的忌辰。今天我們祖國山河破碎，陷於空前未有的黑暗時期，我們爲了復興中國，爲了拯救中國的歷史文化，實應回念這位爲中國文化而付出了終身幸福的武訓先生，更應發揚武訓先生的偉大人格精神。

我對於由亞洲文商學院而蛻化爲新亞書院這一文化事業，始終抱着這一堅決的希望。

對於武訓先生的人格與精神，自來論者已多，但我以爲最能澈底認識，而予以最恰當之評價者，莫如唐君毅先生所著「孔子與人格世界」一書中之所言。他稱：武訓爲「偏至之聖」，而最後則歸之於中國傳統的教化精神。我節錄數言，以見今天新亞所嚮往的那一精神。

「聖賢中之兩格，首爲偏至的聖賢。此所謂偏至的聖賢，即宗教性的人格。其所偏至者，指天而言。……宗教性之人格大皆崇拜上帝……或肯定一絕對之超越人間之境界……或只一絕對犧牲自我忘掉自我之宗教精神，如武訓……至於武訓，則不必有上帝之信仰，然而他以一乞丐，而念自己之未能求學，即終身行乞，以其所積蓄而設學校，以使他人受教，則正表現一宗教性的至誠。乞丐乃一絕對之空無所有者。然而武訓，即從其自身原是空無所有之自覺，而絕對忘我，再不求爲其自身而有所，他即直接體現了無限的精神。……他爲辦學校，完成他人之教育，而向教師與學生跪拜，望他們專心教，專心學。……這些學生和先生之人格，無一能趕上他，但是他向他們跪拜。……這個偉大，在原則上，高過了對與我爲敵的人之原諒，這是一種同一於上帝精神之向人下跪，而不只上帝之化身爲人之子，以爲人贖罪；亦不只是如甘地之使上帝之精神見於政治經濟之事業。這是上帝之精神之匍匐至地，以懇求人之上升至於天之象徵。上帝化身爲空無所有之乞丐。莫有父母，莫有妻子，莫有門徒，莫有羣衆，更重要的是莫有知識，莫有受教育，莫有靈感，莫有才情，不自知爲英雄，不自知爲豪傑，最重要的是不自知爲聖賢，且亦莫有使命感，而只自知爲一乞丐，在一切人之下之乞丐，以懇求人受教育，而完成他自己。這是上帝之最偉大的一表現，人類宗教精神之一種最高的表現。他是爲了完成世間人之所要求而崇拜文化教育之本身。而武訓這種精神則是對孔子之聖賢教化，對人類教育文化之絕對尊重之教而來的。」